



蒙古民族形成史

【苏】莉·列·维克托罗娃/著
陈弘法/译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蒙古民族形成史

【苏】莉·列·维克托罗娃/著
陈弘法/译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蒙古民族形成史/(苏)维克托罗娃著;陈弘法译. —呼和浩特: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2008. 3

ISBN 978-7-5311-6956-7

I. 蒙… II. ①维…②陈… III. 蒙古族—民族历史—研究
IV. K28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27799 号

蒙古民族形成史

[苏]维克托罗娃 著
陈弘法 译

出版·发行/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经销/内蒙古新华书店
印刷/内蒙古爱信达教育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890×1240 毫米 1/32 印张/4.25

版本/2008 年 3 月第 1 版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00 册

社址/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东街维力斯大厦 9 层
电话/(0471)6608179 6608165 邮编:010010
网址/www.in-eph.com
出版声明/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书号:ISBN 978-7-5311-6956-7
定价:1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内蒙古教育出版社联系调换。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石器时代中央亚各民族的祖先	
(民族形成前时期)	14
第二章 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早期时代的中央亚草原居民	
(民族语言共同体形成时期)	26
第三章 公元前一千年至公元后数世纪的部落联合与	
民族形成过程	40
第四章 南鲜卑人基础上形成的民族共同体	54
第五章 辽西鲜卑人(契丹人)及其在三至十二	
世纪民族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64
第六章 北鲜卑诸部及其在蒙古人民族起源中的作用	82
结 语	106
引用书目	110
译者后记	125

引言

本书的意图在于弄清蒙古人^①的起源及其文化渊源,确定蒙古人与其民族祖先——当代蒙古人正是从他们那里继承了构成其民族特点并使之与其他民族区别开来的语言 and 传统经济文化共同体基础——之间的谱系关系,确定蒙古人各种文化成分形成的时代和地点,以及这些成分成为一个固定整体所经历的各个阶段。

本书论及的主要是蒙古史上尚未产生文字的时期。由于缺乏十三世纪之前的蒙古文史料,于是在为数甚多的中央亚古代各民族——其中有一部分在蒙古民族起源过程中起过决定性作用——的族属问题上便出现了种种相互排斥的假说。

中央亚史首批研究家之一、俄国科学院院长帕拉斯提出了蒙古居民源于当地说。他的观点后来得到了 Я·И·施密特〔1824 年〕和 Н·Я·俾丘林〔1828 年〕的支持。俾丘林根据汉文资料推测说,到十九世纪时,蒙古居民依然是公元前两千年的那批居民。中国学者王国维也采取了相似的立场。

然而,这一假说在十九世纪就已遭到质疑。1889 年,在蒙古境内发现了突厥碑铭。这一情况表明,早在六世纪至十三世纪期间,中央亚就出现过突厥帝国(第一突厥汗国和第二突厥汗国)。于是,关于突厥语族(突厥人、回纥人、黠戛斯人)——俾丘林认为他们是蒙古人——的资料便成了蒙古人起源新假说的基础。有人认为,蒙古人

^①本书中使用的“蒙古人”一词,用的是它的广义,即指从蒙古学角度利用历史、地理、民族学文献进行研究的对象——欧亚大陆所有蒙古语族。

是在回纥人和黠戛斯人退出中央亚辽阔草原之后从兴安岭一带和阿穆尔河(黑龙江——译者)中游迁徙而来的。这一事件当发生在公元十世纪至十一世纪期间。在此阶段,蒙古人由森林狩猎民(有一部分人从事炼铁业和渔业)变成草原游牧民〔格鲁姆—格尔日麦洛,1926年;基兹拉索夫,1975年;韩百诗,1970年〕。这一观点的不足之处在于缺乏史料基础,既缺乏文字史料和语言材料,又缺乏蒙古历史民族学资料和考古学资料。

二十世纪上半叶,蒙古学领域盛行过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十二世纪至十三世纪初居住在南至长城、北至西伯利亚、西至东突厥斯坦、东至满洲这一地区的所有民族,均为蒙古语族。但是,这一观点与突厥学资料相悖。突厥学资料认为,从五世纪至十世纪,西部蒙古和中央蒙古居住的是突厥语诸部。十三世纪蒙古编年史《蒙古秘史》也不认为西部蒙古诸部是同源蒙古人,而且十三世纪初西部蒙古诸部使用过的名词术语所反映的均为突厥传统〔村山七郎,1956年〕。

于是,使突厥学资料同蒙古史料、蒙古学文献互相一致起来的工作就事在必行了。既然文字史料没有能为早期阶段提供足够的材料,那就必须扩大史料学基础。复原早期蒙古史的基础便由考古学和民族学来充当了。

蒙古考古遗存的系统研究工作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1948年至1949年,由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C·B·吉谢列夫所领导的苏蒙联合考察队进行了考察。六十年代,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民族学和考古学工作范围进一步拓展,出现了由单独的民族学分队进行的以新的田野资料为基础的专题研究工作。比如,蒙古民族学家C·巴达玛哈登调查了库苏古尔的达尔哈特人和查腾人,研究了北部蒙古突厥语族和蒙古语族接壤地区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过程。蒙古学者们的大部分著作论述了以三河(即鄂嫩河、克鲁伦河、土拉河——译者)流域诸部为基础的喀尔喀蒙古人的形成问题。比如,H·伊希扎木茨正确地将三河流域蒙古人称为三世纪至十四世纪蒙古部族形成的核心。П·贡格尔指出,三河流域蒙古诸部是该地区八世纪居民的后裔,喀尔喀人与三河流域蒙古人之间在民族起源方面有着直接的关系。他认为,在十二世纪和十三世纪的交替时期,三河流域当地蒙

古诸部将其他部落——既有蒙古部落，也有非蒙古部落——联合在自己周围。当蒙古帝国不复存在之后，作为成吉思汗之子拖雷（额毡汗）后代主要封地组成部分的三河流域的蒙古人，保存了古代传统，成为喀尔喀部族的基础。此后，以喀尔喀人为基础，蒙古民族和现代蒙古语开始形成〔贡格尔，1970年，1973年〕。论述中央亚各民族古代史问题的还有Ⅲ·汗德苏荣的著作。她将汉文、日文、蒙古文史料同考古学资料进行比较，得出了如下结论：柔然人是蒙古人的同源部落〔汗德苏荣，1969年〕。考古学家Ⅲ·道尔吉苏荣研究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匈奴遗存之后，弄清了北匈奴在蒙古传统文化形成中所起的作用，并正确地指出有一部分北匈奴成了后来的鲜卑人。Г·苏赫巴特尔有一部著作专门对鲜卑人进行了探讨，书中对鲜卑人和匈奴人的民族关系以及匈奴人、鲜卑人和中央亚其他古代各族的文字问题进行了研究〔苏赫巴特尔，1971年〕。

蒙古学家们为查明古代和中世纪中央亚境内民族形成过程的一般趋向做了大量工作。大多数学者认为，蒙古语族和突厥语族都是在古代和中世纪早期在中央亚境内形成的，他们占据了现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及周围地区颇为广阔的草原地带〔维克托罗娃，1958年；伊希扎木茨，1965年；李盖提，1955年；佩尔列，1959年；苏赫巴特尔，1971年；色尔—奥德扎布，1971年；等等〕。

但是，在确定古代各个民族和部落同现代突厥语族、蒙古语族或通古斯—满洲语族在族源和语言的同源性等个别问题上，尚存在许多争论。匈奴人的族属和语言归类问题也是存有异议的问题之一。十九世纪的研究家忽而认为匈奴人是蒙古人，忽而认为匈奴人是突厥人，忽而认为是斯拉夫人，忽而认为是芬兰—乌戈尔人〔伊诺斯特兰采夫，1926年〕。近数十年来，有的学者认为匈奴人属于突厥语族，有的学者认为属于蒙古语族。突厥语文学家认为突厥语源于匈奴语〔巴斯卡科夫，1964年；马洛夫，1959年〕，而一些蒙古学家则试图证明匈奴人与鲜卑人在谱系上有联系，在语言上是同源的〔道尔吉苏荣，1961年；苏赫巴特尔，1975年〕。

匈牙利阿尔泰学家JL·李盖提以汉文史料和语言材料为基础，于1955年提出了关于中央亚各族与蒙古人在谱系上有联系的假说，

对于解决这些争议很有帮助〔李盖提,1955年〕。他的假说将东胡人、鲜卑人、乌桓人、奚、吐谷浑、契丹人和室韦人联系在一起。这一假说将蒙古人对应为蒙古室韦人。JI·JI·维克托罗娃以上起公元四世纪的蒙古文、突厥文、波斯文和汉文史料为基础,提出了一个更为详细的中央亚蒙古语族和突厥语族谱系关系和民族继承关系表〔维克托罗娃,1958年〕。

1959年,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院通讯院士X·佩尔列的专著《契丹人及其与蒙古人的关系》一书出版(见〔佩尔列,1959年a,第1章〕)。书中附有颇为详细的谱系表。他将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契丹时代考古遗存的研究结果与汉文、蒙古文史料进行了对比,认为泰亦赤兀惕人和达斡尔人是契丹人的后裔,而蒙古室韦人则是蒙古人的后裔。

尽管最近几十年有如上著述问世,然而蒙古人同中央亚古代各族及其民族先辈之间谱系上的关系问题,换言之,即原始蒙古语言、民族文化分布区的区分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近二百年来积累起来的大量文献和就各个问题提出的观点,需要重新考虑并与新资料吻合起来〔巴津,1950年;本青,1953年;克劳松,1960年;苏赫巴特尔,1971年;等等〕。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上半叶,确定蒙古人的祖先问题是从语言学、历史学角度进行研究的,其特点是从史料出发,并形成了一种传统。

现在,研究蒙古人起源及其民族祖先明确的界限问题已经成为一个民族学问题,这就需要一套综合性的研究方法。

综合方法早已成为致力于民族起源问题研究的苏联民族学家著作所采用的一贯方法。本书为避免出现偶然性的对比材料,将采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主要是七世纪至十二世纪期间成为蒙古部族(此后则为喀尔喀人)核心的三河流域蒙古人的民族概述基本参数作为标准数据。本书作者1967年、1968年、1969年在东部蒙古进行田野考察过程中,曾根据专门性提纲对符合其民族概述参数的蒙古人传统文化方面的材料进行了搜集。而后又引证书面史料、语言材料、古代物质文化资料,进行了历史民族学方面的回顾分析,亦即将属于同一类参数的蒙古模式同年代上大体相似的中央亚古代各族的民族概

述进行了对比。在一大段时间内民族文化参数上和语言参数上存在相似现象(甚至相同现象),表明中央亚各族中的某些民族群中存在着谱系上的同源现象;多数参数不相似,则表明不存在这样的同源现象。通过对文化综合体诸成分的比较,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弄清这些成分形成的时间和地区,亦即指明蒙古诸部传统文化发展的基本倾向及其渊源。本书第一编中谈的内容是为完成基本研究课题——构拟原始蒙古诸部、古代蒙古诸部、蒙古人的民族祖先之民族形成过程打基础的。而构拟工作本身则在第二编中完成,其中主要注意力将集中在蒙古族培养基的形成过程和内部发展过程。^①

为了解决蒙古人的起源问题和传统文化的渊源问题,作者使用了各种不同的材料:民族学资料,物质文化遗存,文字史料,语言学材料和人类学材料。

作者在蒙古人民共和国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即1240年蒙古编年史〔指《蒙古秘史》——译者〕提到的蒙古民族于八世纪至十世纪形成时期游牧过的地区——进行田野考察过程中(1967年,1968年,1969年)搜集到的民族学资料,是本书的主要依据。这些资料也可使作者在使用已经发表过的考古学资料时充满信心。已经发表过的考古学资料中,特别重要的有蒙古和苏联考古学家多年来对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物质文化遗存进行系统考察后所刊布的材料。这些材料年代确凿,研究带有综合性质,描述相当细致,又经过一系列专著的汇综〔沃尔科夫,1967年;道尔吉,1971年;纳旺,1971年;诺甫戈罗多娃,1970年;佩尔列,1959年〕。许多论述蒙古人民共和国古代史〔色尔—奥德扎布,1971年;《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1954年〕、中央亚人类初期史〔捷列维扬科,1973年,1975年;拉里切夫,1976年a,6;奥克拉德尼科夫,1960年,1962年,1964年,1972年,1973年〕、图瓦和外贝加尔地区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早期时代〔格里申,1975年;迪科夫,1958年;科诺瓦洛夫,1979年;玛乃—乌勒,1970年〕的综合性著作,就是以这些材料为基础写成的。

应该指出,对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以及邻近地区)搜集到的

①译者注:原书第一编未译出,详情见“译者后记”。

考古学材料需要慎重对待。这些材料一方面由于缺乏某些典型的遗存,另一方面由于考古方法和术语的使用上各具特点,而存在着严重的疏漏之处。根据现有材料,是无法判断出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从匈奴到契丹这一时期古村、古城的类型和性质的。关于突厥时代,也只刊布过一些墓葬建筑和祭祀建筑的资料。属于公元前后几个世纪的所有遗存(无论墓葬,无论居址),又被考古学家们通通归到匈奴名下,虽然据汉文史料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时期在蒙古境内和毗邻地区还存在过与匈奴人为敌的乌桓人、鲜卑人和月氏人。公元93年,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匈奴人的统治结束后,相当一部分匈奴人迁徙到中亚、东突厥斯坦和中国境内临近草原的地区。因此,将蒙古和外贝加尔地区二至三世纪的文化都当成匈奴文化是不合适的,何况即使匈奴人在蒙古草原地区建立政治霸权的时代(公元前三世纪至公元一世纪),这一地区尚有相当大的领域为暂时被认为是具有匈奴文化而实际上是非匈奴民族所占据呢。

鉴于上述原因,本书作者从本书的具体目标和任务出发,在使用东部蒙古境内各个时代的考古学材料时,主要是当作辅助性的历史民族学资料而用以校正其他材料(民族学材料等等)的。

X·佩尔列所领导的1967年、1968年三河流域考察中研究过的各个时代的考古学材料中,有一些所谓“穿越性”成分,见之于不同时期的各个遗存中。这些成分代代重复,是考古学材料、历史民族学材料和民族学材料之间的中介环节,以此可以将古代的原始蒙古语族同原始突厥语族、通古斯—满洲语族区别开来。与此同时,在无疑是蒙古人祖先居住过的地区还发现有其他民族的遗存,这说明在一定的历史时期,非蒙古诸部对蒙古人祖先的政治史和民族史有过影响。

本书所采用的文字史料可分为以下几组。

蒙古帝国建立之后,蒙古历史编纂学得到了蓬勃发展。1240年,第一部用蒙古文写成的著作——《蒙古秘史》问世了。《蒙古秘史》结构严谨,创立了尔后所有蒙古编年史共同拥有的风格。

一、关于始于统治家族的老祖先和创始人孛儿帖赤那、豁埃马阑勒(“苍狼”和“美鹿”)的谱系史。谱系中包括:家族中长幼各支关系材料,成吉思汗家族祖先声名纯洁的材料,周围各部缘亲关系的材

料,蒙古人祖先居住地的材料。

二、关于铁木真(成吉思汗)出世前时代的历史传说,关于其父母、父母诸亲戚的材料,关于铁木真童年、青年时代的材料。

三、关于蒙古诸部联合、蒙古帝国建立过程中各个事件的记载(外交谈判、部落战争、同邻近国家及远方民族的战争)。

四、关于帝国内部状况的详细描述(社会成员在社会结构和正在形成的封建父系制中的地位,他们的权利和义务,官僚行政机构,军事体制等等)。

五、关于窝阔台统治及其改革的简单描述。

这部史书中含有各种体裁的诗作(亲兵赞诗、“使者颂词”、翁吉拉女子赞歌、成吉思汗勇士赞诗)。史书字里行间夹杂着不少民族学资料(宗教信仰、食品、迁徙手段、服饰发型、风俗礼仪等等)。所有这一切都证明,这部巨著乃是一部真正的十三世纪上半叶蒙古人生活状况的百科全书。因此,对《蒙古秘史》在解决蒙古人起源问题方面具有的意义,如何估价也不会过高。《蒙古秘史》(现在的流传形式)是用约四百个汉字对音写成的。各国学者都对它进行过研究、翻译和刊布工作。

此后问世的所有蒙古编年史均用畏吾字写成(这种文字后来经过演变而成为老蒙古文的基础)。从十七世纪及更晚时期的编年史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喇嘛教于十六世纪传入蒙古的情况。比如,每部编年史都在不打乱总体结构的同时,补入有关佛教宇宙观的阐述和有关世界创立的传说。就连蒙古显贵家族的谱系也不再单单以孛儿帖赤那和豁埃马阑勒为开端,而是以印度国王和西藏国王这些佛教的传播者为开端的〔鲍哈,1956年,第10页〕,孛儿帖赤那只是他们的后代而已。这些后来补入的部分从文中是很容易区分出来的。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蒙古编年史的作者和编者对于政治形势和宗教情况并非漠不关心。

在十七世纪及稍晚一些时间的编年史中,值得指出的首先是《阿勒坦·脱卜赤》(《黄金史》)〔沙斯吉娜,1973年〕。以这一书名流传的编年史有几种不同的版本,分别由不同的作者撰写而成,且大部分作者已不可考。其中罗卜藏·丹津《阿勒坦·脱卜赤》(《黄金史纲》)

中含有《蒙古秘史》中的若干片段,还含有《蒙古秘史》中所没有的事实和日期。鄂尔多斯王公萨冈彻辰的著作《额尔德尼·脱卜赤》〔《蒙古源流》〕也享有盛名。较早的蒙古文史料,也许还有汉文史料,都在该书中有反映,因为作者曾提及一个名叫“伯德”或是“巴达”的部落,而“伯德”据认为就是汉文中所谓的“北狄”——“北方野蛮人”或是“白鞑”——“白鞑鞑人”(沙斯吉娜,1957年,第175页,注释157)。佚名氏史著《沙拉·图吉》(《黄史》)的内容与《额尔德尼·脱卜赤》几乎相同。H·II·沙斯吉娜1957年刊布与翻译了《沙拉·图吉》一书,汇总了三种版本。至于对该书的详细描述,最初则是由Д·Ж·扎木察朗诺完成的。

《查干·图克》(《白史》,全称为《十善福白史》)具有特殊地位^①。萨冈彻辰认为该书作者是元朝(1279—1368)创始人忽必烈皇帝。《查干·图克》是确定和阐述基本管理原则的汇集。该书认为世俗政权和宗教政权的和谐结合、宗教和国家为管理人民而将其力量联合起来,乃是理想的管理方式〔扎木察朗诺,1936年,第71—72页,73—76页〕。

所有上述编年史中的谱系部分(通过与其他史料相比较),可导出民族起源的结论提供珍贵资料。C·A·科津正确地指出,这些编年史中插入的部分“不为别的,乃是为了将口头传说的谱系学用文字记录下来”〔科津,1948年,第97页〕。极力将先辈的功勋铭刻在后代心中,为家族关系和家族传统操心,是当时蒙古人所独具的特征。我们知道,那些对本家族及其分支在许多代中的亲属关系做过详细研究的谱系学权威们,总是将这类知识小心翼翼地传给子孙们。正因为如此,有关谱系方面的书籍能起到原著的作用。将这些书籍与其他史籍进行比较,从中可以看出蒙古史早期阶段的年代学、部落间和民族间的联系和关系(毗邻的、亲属的、婚姻的、敌对的等等)。这

^①《白史》早已引起历史学家们的注意。III·纳楚克道尔吉曾有蒙古文著作对该书进行过探讨。蒙古研究家III·比拉从中考察出的事实甚为有趣。比如,他认为,蒙古人宗教政权与世俗政权和谐一致的原则源于公元前后交替时期及公元后最初几个世纪贵霜帝国所推行的原则,也就是说,中世纪蒙古人从中央亚古代各国继承下了许多思想观点〔比拉,1974年〕。

些书籍在解决这类问题中所起的作用,怎样估计也不会过高。这类书籍所含资料的完整性和准确性,是由所述事件与编者生活时代的远近以及与编者亲属关系的疏密决定的。对与编者亲属关系近一些的家族,书中在描述时就比其他家族要详细一些。在对谱系书籍所含资料进行分析时,考虑这种描述手法是很有帮助的。考虑到这一点,就可以使研究人员立即了解到编者的兴趣范围,明确地判断出他的同情之点、反感之处、政治观点、宗教信仰、族属,还可考察出望族与过去各强国代表人物之间存在的谱系关系(关于蒙古人的历史编纂学活动的详细情况,可参见 III·比拉:《蒙古史学史》,1978 年版)。

蒙古语族诸语言早期发展阶段的语言学材料,包含在十三世纪至十四世纪以及此后的许多辞典中。这类辞典有《穆卡迪玛特—阿达勃辞典》和《伊本—穆汉纳辞典》,以及用元代(1269 年)开始使用的方块字刻写的碑铭(连贯性的铭文),伏尔加河流域发现的桦树皮诗文,用汉字译音保存在《华夷译语》字典中的蒙古文词条(海西希、李盖提等人刊布并翻译)。

H·M·雅德林采夫 1889 年首先发现并以其发现地命名为“鄂尔浑碑铭”的突厥如尼碑铭,对于我们研究的这个题目来说,也是重要资料。所有这些碑铭都属于八世纪。铭文系用当时的突厥文刻成。这些铭文中的部落名称和族称未经汉文音译所歪曲,故突厥碑铭成了唐代汉文史料与此后的蒙古文史料之间的联系环节。

古代突厥碑铭反映了早期发生的事件,描述了突厥人与其四邻之间的关系,保存下许多具有历史民族性质的材料。这些材料有助于了解当时突厥诸部的民族心理特征。突厥碑铭为廓清当时突厥语族的分布范围并间接地证明非突厥语诸民族在邻近地区的分布情况,提供了可能性。突厥如尼碑铭及此后的回纥字母、阿拉伯字母碑铭的翻译和刊布工作是由 C·E·马洛夫完成的(马洛夫,1951 年,1959 年)。

十世纪前的中央亚各族史在中国的文字史料中得到了最完整的反映。中国尽管建起了长城,却没有与游牧的和半游牧的北方毗邻民族隔绝开来。

从遥远的古代起,中国就定期向节度使驻地派出特使,为中国朝

廷搜集报告了解到的一切情况。有关新出现在汉廷视野的民族群的最初消息,往往是不准确的,此后才逐渐得到补充并准确起来。驻节中国使者所属民族的资料也在搜集之列。只要出现一个新的部落,中国作者就想极力弄清他们的祖先是些什么人,他们的原名叫什么,记载下他们的语言、分布、经济经营方式、风俗、礼仪、宗教、习性、习惯。这些资料常常是片断的,但其重要性却是毋庸置疑的^①。

汉文史籍中对本书最有价值的是《元史》。《元史》与《蒙古秘史》迥然不同。《元史》中的谱系部分,只从蒙古家族的老祖母阿阑豁阿开始谈起,而没有像《蒙古秘史》记载的那样,始于孛儿帖赤那。但是《元史》中关于十二世纪时部落间混战事件的描述却颇为详细。显然,《元史》为后代保存下来的资料,当在蒙古王朝不再需要不属于蒙古本家族“显贵祖先”的时候编就的。因此,所有与蒙古人家族有疑义的家族群全部从谱系书中被摒除出去。

中国正史中的契丹史(辽史)、女真史(金史)和蒙古史(元史)中所含材料,对本书也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早在宋朝时,中国就出现了有关中国北方民族的首批著作。《契丹国志》的基础是关于契丹人的文献记载和旅行家(即所谓旅人)关于契丹人的报导材料。《辽史》也谈到了契丹人及其地面、风俗、服饰、历法、传说和神话的有关情况。有关辽代记载的基础,可能也是一些真实文献,最初当用契丹文写成,后来才被译成女真文和汉文。我们知道,契丹人不仅有文字,还有丰富的文献,包括历史文献。然而流传至今的只有为数不多的契丹碑铭,且尚未解读出来〔鲁多夫,1963年,第90页〕。契丹文字和契丹文献的广泛传播可以使做出这样的猜想,编者必定搜集过文献作为《辽史》的基础。《辽史》中含有礼仪、宗教、风俗、传说的大量描述,还含有文件、命令、官员报告的原文以及其他材料。此外,该书多处提到相邻民族的情况。

宋代学者宇文懋昭撰写了《大金国志》。该书也像《辽史》一样,

^①本文中的中国史料转引自H·Я·俾丘林、B·C·塔斯金、K·B·维亚特金、Д·М·波兹德涅耶夫、H·B·冠涅尔、A·Г·马利亚夫金等人的译文。此外还引用了B·B·维尔古斯和E·И·基恰诺夫尚未发表的译文。在此,谨向诸位译者提供的方便表示诚挚的谢意。

是一部有关历史民族学概述方面的著作。关于金的另一部史著叫做《金史》，其中部分内容已由 A·T·马利亚夫金译成俄文。

汉文中含有关于蒙古人、原始蒙古人及他们的历史和文化方面的许多记载。本书引用的多半是中国正史中的材料。汉文正史在记载事件时常常有其倾向性，往往以轻蔑的口气谈论所谓“夷族”，但其基本事实还是值得相信的。不过，要引用其中关于民族学结论方面的材料，还是小心谨慎为好。在这方面，原因甚多。比如，“夷族”在成为中国的臣民或向中国寻求庇护时，常常要被“赐给”汉名汉姓。所以在汉文史料中提及的大量汉姓人物，实际上是一些非汉民族的居民，其中许多人是粟特人、突厥人、回纥人或契丹人等〔马利亚夫金，1974 年，第 94 页，100 页，104 页，105 页，117 页，118 页，126 页，129 页，132 页，133 页〕。至于那些无疑地不是汉族而用汉字音译其名字并载入史册的人物，即使已经释读出来，也很难由此引出民族起源方面的结论^①。

至于谈到波斯文和阿拉伯文史籍，那么最有价值的当推拉施特的著作《扎米阿特—塔瓦里赫》（《史集》）。这部史籍反映了十三世纪末至十四世纪初蒙古社会的许多民族学特点。拉施特是伊朗蒙古伊儿汗国旭烈兀王朝朝廷的宰相，他有机会观察蒙古社会的生活状况。汗廷曾派最优秀的了解蒙古人历史、传说、习惯、习性的权威人士协助他编写这部关于蒙古人和其他民族的著作。结果，连拉施特本人也认为，他得到的有关蒙古人起源的材料是互相矛盾且常常是令人怀疑的。拉施特试图将蒙古人设想为突厥—回纥诸部中的一支。他在书中既谈到了本部蒙古人，又谈到了不久前还未被认为是蒙古人但与蒙古人同源的部落，还谈到了与蒙古人风马牛不相及但是属于

^① 这些名字与宗教信仰（比如，佛教徒中会出现西藏人名字和印度人名字，基督教徒中会出现希腊人名字，穆斯林教徒中会出现阿拉伯人名字）、政治关系（比如上面已经提到的汉族或汉族化的姓名）有关。还有为了纪念著名军事行动和纪念战胜敌人而命名的情况（比如传说成吉思汗未称汗前的名字是以被战胜的敌人名字——铁木真而命名的）。此外，史籍中记载的主要是贵族之家、执政王朝代表人物的人名，而这一社会阶层恰恰又因王朝利益的关系而与许多民族联系在一起，故其中常可见到被借用而来的名字。因此，对这类名字只能在对照其他史籍进行详细验证之后，才能用于民族学考证。

蒙古帝国版图因而也接受了“蒙古人”这一名称的部落和民族。可以说,正是拉施特才对十二世纪至十三世纪的民族形成过程作了描述。因此,我们不但不应该对他叙述中产生的不准确之处加以责备,反倒应当感谢他——感谢他引证了种种不同的资料,感谢他不因文害意。拉施特史三大卷已由Л. А. 赫塔古罗夫、О. И. 斯米尔诺娃、Ю. И. 维尔霍夫斯基译成俄文。

十三世纪四五十年代蒙古汗廷住过许多欧洲人,但是留下记载材料的只有两位旅行家:罗马教皇使者约翰·德·普兰·迦尔宾,法国国王路易九世使者威廉·德·鲁不鲁克。这两位使者是作为传教士、基督教的布道者来到草原的。他们每个人都留下了有关十三世纪蒙古人完整的民族学描述,对蒙古人的每个民族特征成分都没有遗漏。经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语言和文字、礼仪和习俗、宗教信仰,乃至与其他游牧民族不同的帽子、服制等细节,以及住所结构的特点等等,无一漏过这两位细心观察家的注意。这两位使者的著作都由Н. И. 米纳耶夫译成了俄文〔《游记》,1957年〕。

属于十三世纪著名旅行家之列的还有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他留下了描写最为有趣、内容最为丰富的有关中央亚诸民族的资料汇编。他为蒙古大汗、元代创始人忽必烈服务了十七年,多次漫游亚洲。他的著作有时将现实与传说纠缠在一起,但是凡是了解到或看到的,都描述得准确无误。这一点使他著作中的许多篇幅如同普兰·迦尔宾和鲁不鲁克游记一样,成为最重要的原始资料。马可·波罗游记也由Н. И. 米纳耶夫译成了俄文〔《马可·波罗游记》,1956年〕。

除上述著作外,本书作者或多或少用到了已经刊布的藏文、叙利亚文、拜占庭文、俄文和其他文种资料的译本。由于本书用到的重要事实材料在上述译本中都是一致的,因此无须再将这些资料另成一组而提及了。还有一些事实材料取自不同研究家所刊布的突厥语、通古斯—满洲语材料(В. И. 岑齐乌斯、В. Г. 鲍罗拉兹、И. И. 扎哈罗夫等人刊布的材料)。文中引自这些材料的引文保留了原材料的音译形式。

作为本书重要资料的,还有蒙古民间口头创作作品。蒙古英雄

史诗作品中保留下了大量的属于蒙古诸部民族史古代阶段的民族学细节。首先应该提及的是著名的《格斯尔传》(见〔达木丁苏荣,1957年,第一章〕)。该作品中除了一些有关蒙古人和其他毗邻民族地理学、民族学方面的资料外,还含有许多重要的历史资料。这些资料可使我们设想出中央亚十一世纪的民族情况和当时各个民族共同体的相互关系。

Б·Я·符拉基米尔佐夫刊布的蒙古一卫拉特英雄史诗巨著,也同样甚为有趣。这类作品含有更早期的成分,其中包括长期存在的物质文化方面的材料,以及有关萨满教、萨满教在人民生活中的作用等方面的资料。符拉基米尔佐夫在其著作的引言中,对这类新的传说的产生过程做了描述。这类传说的题材不是杜撰的,其基本部分总是与民族生活中的具体事件有联系。通常先由说书人将其熟悉的东西、他所参与的事件编成故事,再由说书人亲自演唱,后由别人口头学唱,最后才记录下来。只有说书人的史诗演唱才能受到好评时,他才肯把自己演唱史诗的知识传授给有才华的徒弟。这类民间口头作品是由有文化的蒙古人记载下来的〔符拉基米尔佐夫,1923年〕。民间口头作品往往可以把历史记载中遗漏而又代表蒙古人祖先民族特征的一系列习俗特点保留下来。